

语言文字论集

邓明◎著

YUYAN WENZI LUNJI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语言文字论集

YUYAN WENZI LUNJI

邓明◎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文字论集/邓明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440-3576-7

I. 语… II. 邓…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388 号

语言文字论集

责任编辑 康 健
复 审 邓吉忠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陶雅娜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太原市海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3576-6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6071889

序

新春伊始，我有幸拜读了邓明同志的《语言文字论集》，获益良多。邓明同志是一位勤奋好学、学有所成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实属难能可贵。

《语言文字论集》是他研究成果的阶段性的总结，其中有些文章我过去曾经读过，这次再读一遍，进一步加深了印象。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希望能起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语言文字论集》收录了作者 20 年来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古汉语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共 37 篇，分文字篇、语法篇、词汇篇、应用篇四个部分。综览全书，深感特点和优点颇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广征博引，严谨求证，善于从语言事实的发掘中探寻人们未曾认识的语言规律，不少论文是在定量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再推出定性的结论。翔实的语言材料，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从事实出发做归纳分析和从结论出发做演绎推理是学术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不同的效用。就古汉语研究而言，更多的似应从事实出发做归纳分析，因为古代汉语历时久远，一般人对语言特点和结构规律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从事实出发做归纳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更为可靠。如果简单地从语感出发演绎推理，就难免会犯以今律古的通病。

下面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例子，略作说明：

（一）用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考察某种语言现象。作者否定

传统的词类活用说时，首先从 31 部古代汉语教材和语法著作中根据频率高低依次筛选出 20 个名词活用作动词的例词，然后把这 20 个例词放到先秦 13 部古书中进行穷尽性考察，最后统计出每个例词在名动相应的意义上出现的频率。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动用次数占名动两用总次数的百分比高于 40 的有 3 个词（馆、雨、相），动用百分比在 20-40 之间的有 7 个词（友、蚕、衣、巢、左、冠、门），动用百分比低于 20 的有 10 个词（军、妻、东、臣、王、前、西、君、水、子）。动用百分比高于 20，显然不是“临时的”、“偶然的”、“难得这么一回的”活用，而动用百分比低于 20，也不见得一定就是活用，因为表示相应的动词意义，该词该用法是唯一或主要的表达形式，如“子”动用仅占名动两用总次数的 1.3%，但表示行子道（使行子道）、尽子义（使尽子义）只用动词“子”表示，而表示以为子、视为子虽有别式“以为子”，但仅一见，足见表示相关意义，动词“子”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表达形式。至于动词“子”出现的频率低于名词“子”，那是由交际需要、文献性质以及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所决定的。可见，传统的词类活用说简单地用词频的高低来判定活用，其标准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而判断词频的高低又完全是从语感出发，以历时的古今比较代替共时的横向对比。在否定传统的词类活用说中，语言事实成了最重要的支撑材料。

（二）用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考释词义。《乐羊子妻》“捐失成功”，初中语文教材原注：“意思是失去成功的机会。”注者显然是把古代汉语的“成功”等同于现代汉语的“成功”。作者在《释“成功”》一文中，把“成功”放在先秦 13 部古书中，分离嵌式（“成”、“功”中插入其它词语）和连用式分别进行穷尽性考察。经过详细分析，勾勒出了“成功”由词组（动宾式、偏正式）向词发展的大致线索，并以此考察结果为依据，说明“捐失成功”

的“成功”为偏正词组，意思是已成之事。这种建立在详尽考察基础上的结论，更为准确。

(三)用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补证旧说。对《说文》“足，人之足也，在下体”的训释，从宋代戴侗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杨树达则在《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足》中提出“股、胫、蹠、跟全部为足”的说解。杨氏以“足”之构形立说，可谓确论，但遗憾的是无一书证。当今影响较大的字典、辞书，或不立人体下肢这一义项（如《辞源》），或虽立此义项，却无相应书证（如《汉语大词典》）。作者在《杨氏“足”字说补证》一文中，以《山海经》为例，在分析“足”字全部用例（凡57见）所处的四种语境（“足”直接作谓语、无+足、数词+足、名词+足）的基础上，为杨氏“足”字说补充了40个例证，使“足”之古义建立在充分的语言材料之上，更为可信。

二、引入新思想，采用新方法，开掘了古汉语研究的深度，拓宽了古汉语研究的领域，为传统学科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实践告诉我们，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刻的革命。系统论无疑是当今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学术思想，能否用现代的系统思想指导传统的古汉语研究，作者做了有益的尝试。在《从“尸”的考辨论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一文中，作者指出：传统文字学“字形+书证”的探求本义的方法，是一种孤立的、单向的、静止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不能把握考释对象的全面情况，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考释对象。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把具体事物放在整体系统中作为整体系统的一个要素来考察，“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部首字在不同层面上与亲属部首系统、部首字词义系统、统辖字类义系统发生联系，因此考释某个部首，特别是疑难部首，就应该放在这三个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

如果在这三个系统中考察的结论是重合的，那么，这个重合的结论就是最佳答案。在提出部首字三系合一考辨方法的基础上，作者又具体运用系统考释方法，对部首字“尸”进行了多层面的系统考释，认为“尸”象坐形，本义是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人。本文在提供系统方法的同时，也解决了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的一个学术难题。又如作者在《论词类转化的系统性》一文中指出：汉语词类的转化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因此判定某个词的某种用法是不是活用，既要放在个体词用法系统中考察，也要放在同类词用法系统中考察，即放在类义词用法系统、近义词用法系统、同义词用法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如果某个词的某种用法合乎类义词，特别是近义词、同义词的一般用法，那么，这种用法就不能看作活用。如“囊”是表示器用的词，就用途来说，囊能盛物，它用作动词后表示用囊盛物，符合近义词用法系统和同义词用法系统的一般规律，因而是固有的用法，而不是活用。系统思想的引入，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判定词类活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学术研究需要引入新思想，也需要借鉴新方法。在古汉语研究中，作者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还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试论古汉语不及物动词的与动用法》写于1988年，当时已有不少学者开始运用变换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但运用变换法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学者却并不多见。作者在研究古汉语特殊的动宾关系时，提出了“与动用法”这一概念，并运用变换法论证了这种语言现象。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游吉）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公羊传·庄公九年》：“公曷为与大夫盟。”通过比较“盟大夫”与“与大夫盟”，我们不难发现：二者虽然结构形式不同——前者是“VN”式，后者是“与NV”式，但所表示的意思却是完全相同的。可见，“盟大夫”的“盟”带宾语后用作与动，表示与宾

语共同施行“盟”这一动作行为，“盟大夫”即“与大夫盟”。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基本上是局限于语言自身结构规律的研究。事实上，语言和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仅仅从语言内部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用汉语和汉字推求汉文化，又用汉文化印证汉语和汉字，语言与文化互证，这是9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作者于1983年发表的《从从女之字看女子社会地位的变化》一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虽然当时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受学识所限，文章也比较稚嫩，但在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当初，就能用这种新的视角来审视汉字，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1995年发表的论文《“舅”、“姑”、“甥”、“姪”称谓考》把“舅”、“姑”、“甥”、“姪”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从婚姻形态改变如何引起称谓关系变化的角度，揭示了“舅”、“姑”、“甥”、“姪”称谓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对新方法的运用成熟了许多。

三、深入探究，锐意创新，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创获颇多。作者学历不高，没有受过系统的科研训练，但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思想上没有禁区和套路，而往往凭着自己敏锐的语言嗅觉，善于用新思想、新方法重新审视老问题，也长于从浩繁的语言材料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并以求异求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新论。

在文字方面，《从“尸”的考辨论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一文，以系统思想为指导，通过部首字“尸”的考辨，提出了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即把部首字放在亲属部首系统、统辖字类义系统、部首字词义系统中进行全面的、多向的、立体的考察。运用这个方法考释部首字，特别是疑难部首字，兼顾了与部

首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减少了考释过程中的主观性，增加了考释的准确率，也提高了部首字的解释力。同时，这种整体思想和系统方法对于考释其他汉字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古今字的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义符，改换义符，改变笔画、笔形而创制的，这已被学术界所公认，但今字产生的另一种途径，却不为人所知。《论今字产生的一种特殊途径》通过大量例证，揭示了今字产生的一种特殊途径——另起炉灶，重造新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另起炉灶创制今字的原因、原则和规律。指出：古今字是汉字在扩大文字的表词功能与满足语言表达明晰要求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文字现象，今字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增加汉字形体的显义度和表意的明晰度。另起炉灶创制今字的原则是：根据古字所表示的意义和读音，重造一个有一定理据的新字，从而达到以形载义、因形别义的目的。另起炉灶创制的今字多数是形声字，少数表意字后来也变成了形声字，这与整个汉字形声化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另起炉灶创制今字的系统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汉字孳乳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声符辨音效能新探》一文在对《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鼻音字做穷尽性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利用声符辨别被谐字读音的三种方法：（一）根据语音的系统性原理和语音变化的规律用组合、分解、类比的方法分辨容易误读的形声字；（二）根据半表音声符、不表音声符分布的不平衡性，记少推多，分辨同从一声的形声字；（三）根据基本声符分辨同一谱系的形声字。用这三种方法，可以辨别不同单字、不同字群、不同字系的汉字的读音，使半表音声符和不表音声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表音声符的功能，大大地提高了声符的表音作用和辨音效能。

在词汇方面，作者在占有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探索了古汉语词义演变的一种特殊途径——词义感染。这种语言现象前贤

虽然已经指出，但都是举一两个例子略作说明，看不出词义感染的全貌，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这种语言现象。《古汉语词义感染综论》在《古汉语词义感染例析》、《古汉语词义感染补证》、《古汉语虚词用法感染例析》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性的角度探讨了词义感染的规律（偏正关系的词组感染者居多，联合关系、动补关系的词组感染者次之，动宾关系、联合关系的词组则不存在感染问题）、方式（直接感染、间接感染；单向感染、多向感染；接触感染、侵入感染）和原因（词义模糊导致感染，词义隐遁导致感染，语法关系模糊导致感染，语法功能弱化导致感染），使人们对这种语言现象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同旁字由于有相同的表意偏旁，所以同旁字与表意偏旁的意义必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这种联系究竟如何，却没有人做过深入的探讨。作者在《试论同旁字类义关联》中首次提出“同旁字类义关联”这一概念，并对同旁字类义关联的途径（以形关联、以义关联、形义关联），理据（相似关联、相关关联、相演关联）和类型（放射型、连锁型、综合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指出研究同旁字类义关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汉字形义结合的规律性和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以简驭繁地掌握词义。另外，作者在泛指义与特指义、偏义复词、成语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在词语考释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在语法方面，作者连续撰写 5 篇文章，全面深入地研究词类活用。首先，作者对传统的词类活用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用于本义者不是活用，如“军”、“雨”、“饭”、“後”等；词义引申系统中的基础义不是活用，如用囊盛物是“囊”分别引申为敛藏和蒙住的基础义，已经容入“囊”的词义系统，因而是固有的用法，而非活用；通过“四声别义”裂变成另外一个词者不能算活用，如“王”、“衣”、“冠”、“雨”等；用频高者不可能是活用，如“馆”、

“雨”、“相”、“衣”、“巢”、“冠”、“左”、“门”等；用频较低或很低，但是表示该语义唯一或主要形式者也不是活用，如“臣”、“王”、“前”、“西”、“君”等。其次，揭示了词类活用的本质和判定方法。词类活用属共时范畴，应当采用共时分析和静态描写的方法来研究，把词的不同用法放在同一历史平面上比较分析，而切忌做纵向的古今比较，以免以今律古。活用在不同层面上与本用、兼类相对，本用是词本来的用法，兼类是词本用以外兼有的用法，本用和兼类都是词固有的用法，而活用则是词临时的、偶然的用法。活用和兼类的区别主要不是由词频决定的，而要看体现还是偏离词的价值。在言语交际中，该词是该语义唯一或主要的表达形式，那么，不管它用频高低，都体现了词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如“门”表示攻打城门虽然出现频率低，但表示该语义除动词“门”外，再无别的形式，因而是固有的用法。只有在言语交际中，放着表示该语义固有的表达形式不用，而只是出于个人用词习惯或某种表达需要，在特定的言语片断中采用的一次性的用词方式，才是偏离了词的价值临时的、偶然的用法，才能看作活用。如表示游泳先秦有专门动词“游”和“泳”，“水”表示游泳只有《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一例，足见“水”表示游泳是临时的、偶然的用法，因而是活用。再次，提出了词类活用在古汉语教学中的具体处理意见：（一）对词类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划清兼类与活用的界线；（二）把“词类活用的条件（规律）”改为“在具体语境中辨别词性的方法”；（三）把使动、意动、为动放在特殊的动宾关系中讲授；（四）把意动中表示客观事实的部分改为处动，以便与表示主观看法的部分区别开来；（五）缩小为动用法的范围，为动只包括动词为了宾语（指人）施行某一动作行为和动词因为宾语（指事）施行某一动作行为两类。作者研究词类活用的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多处

转载，广受好评。另外，作者在《试论古汉语不及物动词的与动用法》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与动用法”这一概念，并回答了什么叫与动用法、与动用法的实质以及什么样的词用作与动等基本问题，把特殊动宾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对正确辨别各种不同的动宾关系，进而准确地理解文意是大有裨益的。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具有一种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旧说的可贵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作者在文字、词汇、语法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信作者将沿着这条道路，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山西省语言学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省内外学者的协同攻关，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面貌已经大为改观。这是和有邓明同志这样的后起之秀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语言文字论集》的出版，是对我省语言学的一个贡献，也是对我省语言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极大激励和鼓舞，这无疑将有力地促进我省语言学的发展和繁荣，故乐为之序。

温端政

2008年4月1日

目 录

文字篇

从“尸”的考辨论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	1
论今字产生的一种特殊途径	13
声符辨音效能新探	25
“告”字会意发微	34
杨氏“足”字说补证	38
女旁字的文化观照	42

语法篇

词类活用辨惑	52
关于词类活用问题的再认识	63
论词类转化的系统性	79
“雨”字活用说刍议	91
关于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词类活用的处理意见	95
试论古汉语不及物动词的与动用法	102
判断句三题	112

词汇篇

古汉语词义感染例析	116
-----------	-----

古汉语词义感染补证	121
古代汉语虚词用法感染例析	125
古汉语词义感染综论	130
试论同旁字类义关联	138
泛指义特指义与古汉语词汇研究	147
浅谈“VN ₁ N ₂ ”结构中 N ₁ N ₂ 的偏义问题	154
试论自释性状貌词成语的形成及表意特点	159
“舅”、“姑”、“甥”、“姪”称谓考	165
“睛”字本义小考	170
“腩脚”考辨	173
孙腩究竟受的是什么刑——与李乔先生商榷	178
释“成功”	184
古汉语词义札记	191
《古代汉语》虚词订补	202
应用篇	
同音同形字避复中的语言规范	211
字典辞典书名同音避复指误	220
标题舛误种种	223
《中华成语大辞典》简评	231
后记	236

从“尸”的考辨 论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

〔提要〕 本文以系统思想为指导，通过部首字“尸”的考辨，提出了部首字三系合一的考辨方法，即把部首字放在亲属部首系统、统辖字类义系统、部首字词义系统中进行全面的、多向的、立体的考察，如果在这三个系统中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么，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答案。用这个方法考释部首字，兼顾了与部首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减少了考释过程中的主观性，增加了考释的准确率，也提高了部首字的解释力。

部首是许慎的一大发明，以部首统字是《说文》的一大创举。由于部首字在汉字大家族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历代学者对部首字的考释颇为重视。前修在部首字考释上硕果累累，但在方法论上却似乎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本文拟以系统思想为指导，从“尸”的考辨中探索部首字考释及辨正的最佳方法。

“尸”之所象，“尸”之所指，历来众说不一，兹录如次：

（一）象卧（隐几而卧）形，义为陈列或神像。^①

（二）象首俯曲背形，义为陈列或神像。^②

（三）象箕踞形，为“屮”之本字。^③

（四）象高坐形，为“夷”之本字。^④

（五）象屈膝形，为“夷”之本字。^⑤

（六）象偃寝形，为“屍”之本字。^⑥

（七）象侧立形，“尸”即“人”。^⑦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部首字能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我想除了

说解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外，恐怕更主要的是方法论上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方法论的反思。

传统文字学主要用分析字形的办法来探求本义（包括部首字本义）。通过分析字形揭示本义，又用书证或某些旁证来证实本义的存在，以形义的和谐统一来显示分析的有理有据。用这种“字形+书证”的方法说明一般汉字的形义是可以的，但用来考释疑难汉字，特别是疑难部首字的形义就显得无能为力。从理论上讲，“字形+书证”是一种孤立的、单向的、静止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不能把握考释对象的全面情况，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考释对象。从实践上来看，汉字的一字多形，汉语的一词多义，人们观察字形的多种角度，很难避免字形分析的主观随意性。下面以“尸”为例说明传统方法的局限性。

（1）古文字的一字多形容易造成取舍字形的为我所用，形成不同说解。“尸”有以下六种有代表性的写法：① 𠂇（粹五一九）；② 𠂇（丰兮尸簋）；③ 𠂇（景卣）；④ 𠂇（甲后一八四）；⑤ 𠂇（乙四〇五）、𠂇（无彘簋）；⑥ 𠂇（铁三五·二）、𠂇（孟鼎）。立足于第①种写法，似乎象侧立形；立足于第②种写法，似乎象首俯曲背形；立足于第③种写法，似乎象箕踞形；立足于第④种写法，似乎象偃寝形；立足于第⑤种写法，似乎象坐形；立足于第⑥种写法，似乎侧立形、首俯曲背形、坐形、高坐形、屈膝形兼而有之。如果我们对“尸”的各种不同写法缺乏全面了解或未经深入考察，而只凭某种形体加以判断，就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2）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观察形体，容易各执一端，固执己见，形成不同说解。“尸”的形体以第⑥种写法为常见。即以常见的一种形体来考察，也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因为孤立的一个形体，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尸”从整体来看，象侧面人形。从局部来看，着眼于头和背，可以说象首俯曲背形；着眼于臀部，可以说象坐形；着眼于腿部，

可以说象屈膝形；如果把“尸”顺时针转 90°，也可以说象偃寝形。^⑧

(3)以书证佐字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分析字形的主观随意性，但书证只能说明某个义项曾在书面语中使用过，并不能证明某个义项一定就是本义。旁证可以增加字形分析的可信程度，但孤立的旁证很难证实某种解释就是确论。诸家对“尸”的不同说解，除“尸”为“屍”之本字、“尸”与“人”义同没有佐证外，其它均有书证或旁证。我们可以说没有佐证的说解不足信，却无从证实同有书证或旁证的说解孰是孰非。

正因为“字形+书证”这种方法有严重的不足，所以用这种方法考释疑难文字特别是疑难部首字一定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字形+书证”的方法之所以不适合考释疑难部首字，除了这种方法本身的缺陷外，还因为部首字有它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用考释一般文字的方法来考释部首字。部首字作为汉字的一部分，它具有一般汉字的共性，又有其不同于一般汉字的特性。部首字多为早期文字，源远流长，是汉字繁衍孳生的母体。由于历时久远，所以有些部首字的形义“沉淀”了，这为部首字的考释带来了一定困难。由于部首字与更多的汉字有“姻缘”关系，所以它的形义必然在这些有“姻缘”关系的汉字中有所反映，这又为部首字的考释带来了有利条件。考释部首字就是要从部首字的特点出发，利用一切可知因素，深挖“沉淀”了的形义。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有机的整体，几乎都自成系统或互成系统。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把具体事物放在整体系统中作为整体系统的一个要素来考察，“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⑨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把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⑩